岁星纪年十二次名义考

聶鸿音　黄振华

内容提要：本文论证中国古代岁星纪年十二次的词源。文中以古汉藏语或上古汉语方言考证十二次与十二支、十二生肖相配。此与汉唐以来郑玄、陆德明所说迥异，而与今人张闻玉主张星纪表寅虎之说相印证，有助于检验散见于古籍中的岁星纪年记录的正确性，可供确定武王克商年代参考。

关键词：古天文学　岁星　十二次　纪年法

在汉代以前，中国历法即有所谓黄帝历、颛顼历、夏历、殷历、周历和鲁历，史称“古六历”①。其纪年则有所谓岁星纪年、太岁纪年。前者实与生肖纪年相当，后者实与干支纪年相当。至东汉顺帝朝，始行用甲子纪年，一直行用到现代。太岁纪年见于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尔雅》等书。汉武帝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，行太初历，用夏正。《史记·历书》历术甲子篇保存了太初元年至建始四年（前104年至前29年）采用太岁纪年的完整记录②。岁星纪年的具体名目，则见于《礼记·月令》郑玄注和《尚书·尧典》陆德明音义，依次为娵訾、降娄、大梁、实沈、鹑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、星纪、玄枵，史称“十二次”。

据天文史家研究，古代天官观测到木星运行一周天，是以12个回归年为周期，便将天赤道划为12等分，而以木星为岁星，用以纪年。十二次即对应于赤道12等分，木星一年经行一次，遂称岁在某某。这种岁星纪年法，初用于春秋中期，曾有零星记载传世。例如：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：“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。”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昔武王伐殷，岁在鹑火。”这就是两个重要的岁星纪年记录。前者对明瞭岁星纪年的特点（跳辰）及其计算方法，后者对于确定武王克商之年，都具有决定性意义。惟此十二次纪年顺序如何与十二地支匹配，则颇有异说。

一　汉代郑玄说（见《礼记·月令》注）

孟春者，日月会于諏訾而斗建寅之辰；
仲春者，日月会于降娄而斗建卯之辰；
季春者，日月会于大梁而斗建辰之辰；

孟夏者，日月会于实沈而斗建巳之辰；
仲夏者，日月会于鹑首而斗建午之辰；
季夏者，日月会于鹑火而斗建未之辰；

孟秋者，日月会于鹑尾而斗建申之辰；
仲秋者，日月会于寿星而斗建酉之辰；
季秋者，日月会于大火而斗建戌之辰；

孟冬者，日月会于析木而斗建亥之辰；
仲冬者，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；
季冬者，日月会于玄枵而斗建丑之辰。

二　唐代陆德明说（见《尚书·尧典》音义）

寅曰析木　卯曰大火　辰曰寿星
巳曰鹑尾　午曰鹑火　未曰鹑首

申曰实沈　酉曰大梁　戌曰降娄
亥曰娵訾　子曰玄枵　丑曰星纪

三　近人张闻玉说（见《古代天文历法论集》）

星纪为寅　玄枵为卯　娵訾为辰
降娄为巳　大梁为午　实沈为未
鹑首为申　鹑火为酉　鹑尾为戌
寿星为亥　大火为子　析木为丑

前人对此岁星纪年十二次的名称所作的解释，一如其解释太岁纪年的岁阴岁阳名称，多言不及义。例如《尔雅》有谓“星纪，斗牵牛也”，郭璞注曰：“牵牛斗者，日月五星之所始终，故谓之星纪。”《尔雅》又谓“玄枵，虚也”，郭璞注曰：“虚在正北，北方黑色；枵之言耗，耗亦虚意。”这种析义，犹如李巡解释《尔雅》所谓摄提格、单阏之类，如“言万物承阳起，故曰摄提格。格，起也”；“阳气推万物而起，故曰单阏。单，尽也；阏，止也”④。清代大儒郝懿行著《尔雅义疏》，亦无非因袭旧说。例如：

> 史记索隐引李巡云，万物承阳起，故曰摄提格。格，起也，淮南子天文训云，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。高诱注：格，起，万物承阳而起。易纬是类谋云，摄提招纪。郑注云：摄提招纪，天元甲寅之岁。

此等疏义，虽旁征博引，只是空谈，且郝氏本人有何高见，讳莫如深。

我们在《岁阴岁阳名义考》一文中，曾以上古汉语方言或古汉藏共同语解释摄提格、单阏等名称。实则前者表示“虎”，后者表示“兔”⑤。准此，岁星纪年十二次名称的正确解释，亦可求之于上古汉语方言或古汉藏共同语。

汉代扬雄在《方言》中称：陈魏宋楚之间谓“虎”为“李父”，江淮南楚之间谓“虎”为“李耳”。今此称谓仍见于汉藏系语言。例如：

巍山彝语 la-pa、吕苏语 læ-phæ、苗语 ly-pa 等词皆义为“虎”，但喜德彝语则简称“老虎”为 la，而称“狮子”为 la-ni（李耳）。与此相反，傈僳语称“狮子”为 lu，而称“老虎”为 si-ts*ɯ*。埃及、印度、希腊亦以“狮”对应中国“虎”⑥。这种“狮”、“虎”易称现象，对于我们解释岁星纪年的十二次名称，颇具启发意义。

例如“狮子”之称，在藏文、藏语就有 seŋ-ge、seŋ-ke、shaŋ-ŋge、shaŋ-ke、sẽ-ŋge 等词。此外还有门巴语 seŋ-ke、seŋ-ge、普米语 sẽ-ge、si-ŋgi、嘉戎语 sə-ŋgə、木雅语 si-ŋgi、却域语 si-ŋgi、吕苏语 si-ngi、史兴语 si-ngi、道孚语 sə-ngi、扎壩语 se-ngi、贵琼语 sə-ŋge、洛巴语 ɕ*ɯɯ*ŋ-gi、傈语 s*ɯɯ*ŋ-gi 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狮子”。

由此可见，岁星纪年十二次的“星纪”原义为“虎”，今犹存在于傈僳语 si-ts*ɯ*，但在众多汉藏系语言中，“星纪”已改称为“狮”。

若此说不误，则其后所谓“玄枵”当表示“兔（卯）”。可比较傈僳语 a-ɣa、侗语 kha-ko、藏语 ʐi-ɣũ、贵琼语 ʐə-kũ、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兔”。西夏语则简称为“讹”（喉音），拟音为 ɣuẽ。

所谓“娵訾”当表示“龙（辰）”。可比较阿昌语 mʐui-tʂuŋ、仙岛语 mʐui-tʂuŋ，其简化形式则有藏语 tʂu、ndʐuk、ndʐəx、道孚语 ndʐu、木雅语 ndʐu、贵琼语 ndʐu、却域语 mdʐy、扎壩语 mtʂə、瑶语 tɕiuŋ、苗语 Za*ɯ* 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龙”。

所谓“降娄”当表示“蛇（巳）”。可比较瑶语 ku-laŋ、怒语 kri-liɔ、布依语 ŋ*ɯɯ*ə-lau、傣语 ŋu-lɣm、仙岛语 tshi-lit、临高语 tsia$^{?}$-laŋ-ləi 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蟒蛇、四脚蛇”，其简化形式则有 khua、基诺语 ɣ*ɯ*、傣语 l*ɯɯ*m、ləm 以及藏语 ru、木雅语 ro、西夏语“囉”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蛇”。

所谓“大梁”当表示“马（午）”。此称以简化形式保存在下列汉藏系语言中。例如藏语 ta、

门巴语te、苗语ta-、侗语tak-、水语tak-、瑶语tuŋ-、苗语de-、西夏语liɛ、ria、史兴语ro、羌语ru、道孚语rɣi、侗语lak-、水语lak-、毛难语lak-、临高语lək-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马、马驹”。

所谓“实沈”当表示“羊（未）”。见于门巴语ɕi-ɕa、景颇语sa-ku、布依语ʐuŋ-ɕin、普米语tshi-ʒõ和简化形式如藏语she$^{?}$、拉祜语ʐi、土家语zo、毛难语zo、布依语ʐuŋ、黎语zeŋ、苗语ʐoŋ、彝语ʐo、拉祜语ʐɔ、却域语ʐe、河西译语“思”，以及临高语tuaŋ、傣语tsen、怒语tshə、藏语tʂhom、贵琼语tɕhã、白语tsa-no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羊、绵羊、山羊”。

所谓“鹑首”当表示“猴（申）”。见于瑶语heu-suən、普米语tsɛ-ʐy、白语ɣo-sua以及简化形式如史兴语ʐu、藏语wsi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猴”。

所谓“鹑火”当表示“鸡（酉）”。见于藏语ɕa-wo以及简化形式如吕苏语ɣua、浪速语ɣɔ$^{?}$、彝语ɣa、拉祜语ɣa、嘎卓语ɣa、景颇语u、道孚语ɣra、怒语ɣra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鸡”。

所谓“鹑尾”当表示“狗（戌）”。见于瑶语nte-men和ku-tsun以及简化形式如壮语ma、布依语ma、傣语ma、水语ma、毛难语ma、临高语mã、黎语ma、pa、苗语ma*ɯ*、拉祜语phul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狗、猎狗”。

所谓“寿星”当表示“猪（亥）”。其简化形式于壮语ɕen、布依语ɕen、瑶语sa、木雅语ʐy等语词，其义皆为“猪、豪猪”。

所谓“大火”当表示“鼠（子）”。见于洛巴语ta-kə、瑶语to-ka和藏语tsə-ɣə及反序语藏词ka-da、ka-ta、黎语t*ɯ*-do、临高语ka-duk、吕苏语ku-tsæ、洛巴语ka-tɕi、傈语ka-kɕi、哈尼语xu-tsa、基诺语xo-tʃhe、普米语ku-tɕo、吕苏语ku-tʂæ等，其简化形式见于普米语ro，却域语xue、彝语xæ、ha、纳西语fv、傣语hak以及黎语tiu、独龙语d*ɯɯ*t、瑶语tiŋ等语词。以上词义皆为“鼠、松鼠”。

所谓“析木”当表示“牛（丑）”。见于扎壩语ʃo-pu、史兴语ʐu-bɜ、门巴语dʐa-min及简化形式如壮语ɕ*ɯ*、布依语ɕie、侗语sen、苗语ʐu、羌语ʐə和水语mo、藏语ba、pa、pha、土家语wu、史兴语wɜ等语词。以上词义皆为“牛、黄牛”。

综上所考，不难确信岁星纪年十二次之称，也同岁阴岁阳诸名称一样，可从汉藏系语言中窥见其踪影。即星纪表虎、玄枵表兔、娵訾表龙、降娄表蛇、大梁表马、实沈表羊、鹑首表猴、鹑火表鸡、鹑尾表狗、寿星表猪、大火表鼠、析木表牛。此与前引张闻玉之说正合。

事实上前人亦有如此划分。例如晋杜预注“左昭三十二年岁在星纪”，唐代孔颖达疏即曾指出此年岁星在寅。

散见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的岁星纪年记录有20余条之多，如以星纪为寅，则据此种纪年法84年跳辰一次的特点排比推算，可以证明古籍记载大都不误，亦与史实相符。著名天文史家江晓原教授在其近著《回天——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》（2000年）一书中，竟声称他们对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所载岁星纪年进行了“地毯式的检索”、“用目前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星历表软件DE404进行回推计算，结果发现竟无一吻合！”（见该书98页）如此轻率否定历史记载，实不可取。如果真能根据岁星纪年的特点排出像样的年表，自不致如此武断。本文限于篇幅，恕不详述，容另文讨论。

必须指出，既然岁星纪年十二次的名称今尚残存在许多汉藏系语言中，这就表明旧说传自西方的观点是错误的。据说最早是英国伦敦会教士查默斯·约翰（Chalmers John，1825—

1899年）在《中国古代天文学考》一文中声言：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都是从印度和巴比伦传入的⑦。中国学者追随此说者亦不乏人。例如郭沫若早在《释支干》一文中就说什么公元前两千年即传自巴比伦⑧。陈美东教授主编的《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·天文卷》一书明确指出，十二次等分周天法与巴比伦的十二宫划分法有相似之处，并没有涉及渊源关系⑨。倒是江晓原教授更明确指出，将巴比伦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视为两个各自独立起源的体系，是“比较稳妥”的⑩。

本文引用现存汉藏系语言考证岁星纪年十二次名义，非谓这些名称术语乃是少数民族语言而不属于汉语。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承认，汉藏语系是由藏缅语族、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所组成，其中以汉语的历史最为古老，文字文献最为丰富，其次则为藏语和西夏语等。可以设想，十二次的名称实是上古汉语方言或汉藏共同语词汇，有谓礼失求诸野，所以今天才能在众多汉藏系语言中找到遗存。

本文考定星纪为虎（寅）、玄枵为兔（卯）等等，不合前引汉唐学者郑玄和陆德明旧说，自不免怀疑所考是否正确。抛砖引玉，请方家指正。

---

① 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“历数之起上矣。……三代既没，五伯之末史官司丧纪，畴人子弟分散，或在夷狄，故其所记，有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及鲁历。”

② 后世仍有史书采用太岁纪年。如宋代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、清代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。宋代吕祖谦且曾以太岁纪年编制《大事记》，上起周敬王三十九年（公元前481年）上章涒滩（庚申），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屠维协洽（己未），共1440年。见《说郛》第5册，第227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。间有佛教僧侣亦采用太岁纪年。例如唐代宗撰《大唐新翻护国仁王经序》即称“时旃蒙岁木堇荣月”，相当于公元765或775年乙卯仲夏。见《中国密宗大典》第5册，第454页，中国藏学出版社。又如清代广润道忞撰《显圣三宜禅师语录序》称：“岁在著雍困敦，月维林钟”相当于1648年戊子六月。见《中国禅宗大典》第12册，第3页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。甚至还有日本僧侣也采用太岁纪年。例如《白伞盖佛顶瑜伽秘要略念诵》跋文所记付梓之年为“（日本）延享元星舍阏逢困敦”，相当于日本延享元年（1744年）甲子。至于太岁纪年诸名称的语源详见拙作《岁阴岁阳名义考》，《燕京学报》新6期，1998年。

③ 张闻玉：《古代天文历法论集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77页。

④ 见《史记·天官书》索隐。

⑤ 见前引《岁阴岁阳名义考》。

⑥ 本文所引汉藏系语言主要取自：黄布凡主编《藏缅语族语言词汇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92年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1年。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《苗瑶语方言词汇集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87年。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《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⑦ 此人1852年到香港传教，后继理雅各主持伦敦会香港分会。所著尚有《中国人的起源》，（1865）、《粤语袖珍字典》（1872）、《康熙字典撮要》（1877）等。还曾将《圣经》译为汉语。陈遵妫《中国天文学史》引作“谌约翰”（1984年，第1册，第26页）。竺可桢《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》引作“圣约翰”（《科学通报》第2卷第3期，1951年）。

⑧ 郭沫若在文中说：“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，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，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？抑或商室本发源于东方，其星历智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耶？”数十年来，未见郭氏对其观点作何改变。见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卷一，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83-284页。

⑨ 文中指出：中国出现十二次等分周天法和岁星纪年法，约在公元前7世纪。见该书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5页。

（下转第64页）

中很习见。“千金”象征贵重，如一字千金、一诺千金等。由于洛阳铜镜上“千金”二字为小篆体而兼有西汉文字特点，因而铸镜的年代不可能早至战国。

洛阳出土的羽状纹铜镜，其外沿较宽，羽状纹图形也显得很呆板；而长沙楚墓出土的羽状纹铜镜，其铜镜钮座一般呈匙面状，且镜子的外沿较窄（图九）。故洛阳出土的羽状纹铜镜，显然属仿楚式镜的变形式样，结合“千金”二字的时代特点分析，其相对年代也相当西汉文景时期。

三 结论

洛阳出土的“千金”铭文铜镜，其铭文字形为西汉时期常见的秦式小篆体，涡状云纹为西汉文景时期铜镜中习见的地纹，它与战国楚式镜中的云锦纹地是有区别的。其蟠螭纹实为西汉时期常见的地方连变形龙纹，这种变形的龙纹图形显得粗糙而简略，为战国铜镜中所未见，实为西汉时期常见的变形楚式铜镜。其相对年代约相当于西汉文景之际。也就是说，洛阳发现的“千金”铭铜镜，其年代定为战国晚期是不妥的。

① 蔡运章：《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》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9期。

② 湖南省博物馆等：《长沙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③ 湖南省博物馆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》下集，竹简二六六、二六八，文物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240页。

④ 周世荣：《中国文物鉴赏全集[4]·古铜镜》图146，台北度假出版有限公司，1995年，第75-77页。

⑤ 同④，第45页，图45。

（上接第60页）

⑩ 见江晓原、钮卫星著《天文西学东渐集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。不过在《历史上的星占学》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）一书中，江晓原教授还是说“十二次……这套体系的起源，也尚未完全弄清楚。十二个奇怪的名称何所取义，古代星占学文献虽然偶有论述，但是也不得要领”。